



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1



1950年梁英明在巴中高中毕业时留影

1931年5月28日，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文化名城梭罗市。父母都来自广东新会。岁月匆匆，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往事历历，却又依然恍如昨日。

在那个特殊的火红年代，在美丽的椰岛之国，曾涌现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爱国华侨青年。我不过是那个时代洪流中的一个小水滴。然而，从梭罗河畔的快乐童年，到雅加达的战斗生活，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因为它映照出我成长的足迹。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在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从印度尼西亚到整个东南亚华侨社会出现了左右两派分化以至对立和争斗。这正是我从少年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的过程。青年学生成为争斗的主力军，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当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和革命积极性，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潮流和前进方向。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

们重温往事，回忆走过的道路，仍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满腔热情，当然也已认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甚至某些过激思想。当然，历史既不可能抹去，时代也不会重现，我们只能在不断反思中进步。

梭罗中华学校

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华侨人数众多，历史悠久。他们大都来自广东和福建农村，未曾受过什么正规学校教育。为了让后代不至于数典忘祖，华侨的众多同乡会分别兴办了自己的私塾，用方言讲授四书五经等中文典籍。直到1901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建了中华会馆学校（简称中华学校），印度尼西亚华侨才拥有了第一所现代华文学校。与过去的私塾不同的是，巴达维亚八帝贯街的中华学校（简称八华学校）使用国语授课，课程内容也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音乐、体育等。其后，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同样的现代华文学校，而且都称为中华会馆学校（Sekolah Tiong Hoa Hwee Koan）。

1904年，梭罗中华学校创立。1938年，我开始在梭罗中华学校读书。

我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还只是一所小学，全校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共有学生约200名，教师十几名。校长是陈梗才老师。各地中华学校在



1952年雅加达华侨庆祝中国国庆运动会主席台，梁英明任大会司仪

20世纪初年创立时，师资都很缺乏，教师水平也不高。1907年，清朝在南京市创办一所专门招收东南亚华侨学生的学校，称为暨南学堂，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暨南学校（中学）。1928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后，又发展为暨南大学，仍以招收华侨学生为主。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侨子弟从暨南大学毕业后，返回印尼各地中华学校担任教师。到我开始上学的时候，梭罗中华学校已有好几位老师是暨南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我至今还记得的有校长陈梗才及数学老师侯长龄和英文老师林璧良等。

20年代后期开始，来自中国的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他们除在原有的中华学校任教以外，还创建了更多的华侨学校，例如梭罗华侨公学等。中华民国政府曾对海外华侨学校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指定上海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专

供海外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因此，华侨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都是与中国国内的学校“接轨”的。但是，各地的中华学校比其他华侨学校似乎更加注重英文课程水平。例如，梭罗中华学校三年级就开始有英文课，用的是英国出版的教科书，称为“Royal Crown Readers”，它的内容比中国开明书局出版的英文教科书更艰深一些。

刚开始上课时的印象已经模糊不清，只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考试成绩最好的都是女生，男生似乎只知道玩。从三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进步，从此每个学期考试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父亲忙于店里的工

果或者一杯冰汽水。学校门口就有卖零食的小摊商。

我在中华学校无忧无虑地读到小学四年级，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梭罗时才被迫辍学。

结缘羽球

在中华学校读书期间，令我最为难忘的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学打羽毛球。直到今天，羽毛球仍然是我喜爱和坚持的运动。

也许因为当时中华学校的学生不太多，我们的校长与学生家长之间经常有联系。记得在我升入四年级的时候，陈梗才校长就曾来到我家。他对我父亲说到我的学习成绩良好，要我多参加体育运动，并建议我打羽毛球。

实际上，我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当时，学校有两张乒乓球桌，还有一副单杠。我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和同学打乒乓球，或自己在单杠上玩。学校的大厅里有乒乓球桌，还有球拍和球供我们玩，而学校的操场虽有两块沙地羽毛球场地，学生打球却要自备羽毛球拍和羽毛球。因此，我此前从未打过羽毛球。

父亲听从陈校长的建议，给我三盾钱，让我自己去买一把羽毛球拍。我当然很高兴，便立即到一家华侨开设的“廉价百货商店”（Toko Obrol），花两盾半〔“盾”（rupiah）是荷属东印度的货币单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仍使用rupiah为货币



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2

名称] 买了一把“邓禄普”(Dunlop)牌羽毛球拍。邓禄普是著名的英国体育用品品牌，邓禄普公司生产的羽毛球拍、乒乓球拍和网球拍都是当年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从接触羽毛球以后，就迷上这项运动，乒乓球就打得了。学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我必到学校打羽毛球。一起打球的小伙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奠基人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他们和我年龄相仿，但当时已掌握很好的球技，而我则是新手。因此，我总是打不过他们。然而不久以后，我们三个人的技术可以说已是不相上下了。正好我和陈福寿的家相距不远。我们打听到在我家附近一家华侨开设的“胜利商店”(Toko Menang)里，有几位青年店员常在星期天到商店后面的梭罗河畔打羽毛球，于是我们就加入他们的队伍。每个星期日早晨我起床后，自己吃两块点心，就在门口等陈福寿过来，然后一起去打球。在那些打球的成年人当中，有一位叫许硕文的球技最好。我们都叫他“硕文哥”。这位硕文哥不但技术好，还热心教我们这两个小孩子打球。硕文哥的球技灵活多变，尤其善于运用假动作，让对手防不胜防。快速反应的“假动作”至今仍是东南亚羽毛球运动员的特点和优势。可以说，硕文哥是我们的启蒙老



1948年高二乙班同学合影。
二排右一为班主任刘宏谦老师。

师。

梭罗广肇会馆

东南亚早期的中国移民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相互帮助而成立了各种同乡会。这些同乡会给新来的乡亲们提供临时住所并介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梭罗主要的华侨社团就是四个同乡会，即客属公会、和合会馆、玉融公会和广肇会馆。其中，广肇会馆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父亲尊崇孙中山先生，信奉三民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参加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热心为同乡服务，受到大家尊重，曾长期担任广肇会馆主席，直到1962年病逝。

大约从1940年开始，父亲让我和弟弟参加广肇会馆的武术班。武术班有十来个人，大多是小学生，晚上在会馆训练。教我们武术的是林振光师傅。在我们

这些孩子眼里，林师傅是一位武术高手。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从不责骂我们，但要求很严格。我们跟林师傅学了空拳、长棍、长枪、三节棍、长凳和双刀等套路。

舞狮是广东人的习俗，因此梭罗广肇会馆也有一支醒狮队。广肇会馆的醒狮队逢年过节都要出动，到一些广东人的商铺拜年。商家会送红包作为会馆的活动费。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梭罗的华侨也以“赈济祖国难民”的名义积极筹款支援祖国抗日。此后，广肇会馆醒狮队向商家拜年的目的就是为祖国抗日战争筹款。到1941年，我已经10岁，林师傅认为我的武术学得还不错，于是从武术班中挑选我和我的表兄加入醒狮队。

我的表兄当时大约有16岁，他已经有力气舞狮头了，而我只能舞绣球。我们醒狮队的绣球不是用手拿住的，而

是将绣球安装在一根木棍上，我要不断挥舞木棍，让绣球飞速滚动，引导狮子跟着绣球上下起舞。为了让舞狮活动更具有观赏性，商家往往用竹竿把红包高高挂起来，让狮子张嘴把红包吞进去。我的任务就是要高举安装绣球的木棍，把狮子引到红包面前。狮子“吃”了红包后，就向商家拜谢。三通锣鼓之后，狮子就可以离开了。当大人们清点收到的捐款时，都感到很高兴。我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觉得自己能为祖国的难民出一点力，心里也感到很自豪。

日军铁蹄下的生活

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突袭夏威夷珍珠港后，我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要“南进”，梭罗恐怕不能幸免了。小小年纪，对战争的残酷不会有什么认识。我每天照常上课，只记得家里的玻璃门窗都用纸条贴成了米字形，以防遭到日军空袭时，玻璃被炸碎伤人。同时，家里所有的电灯泡都罩上了黑布，也是预防日本空军晚上轰炸时看到地面目标。但是，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没有过多久，日军也没有轰炸梭罗。大约因为梭罗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吧。

1942年2月的一天，忽然听说日本军队快打到梭罗了。大家都不知道战火会不会烧到家门

口，于是纷纷逃往乡村躲避。父母亲收拾好一点细软，便带着四个孩子和我的奶奶一起逃到郊外乡村。我们没有目的地，只是以为离开城市就安全。中午，我们在乡下印尼人的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隐约听到从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不久就又逐渐恢复平静。到傍晚时分，听说日本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梭罗市区，于是父亲又带着我们随着人流回到家里。

听说梭罗的荷兰人事先已经逃离，他们的家也被当地人洗劫一空，一些人扛着漂亮的沙发、桌椅、收音机和时钟等抢来的物品在街上叫卖。我们的家在华侨商店集中的市中心，没有遭到抢劫，算是幸运。

至于早先听到的枪声，原来是日军敲打汽油桶和在汽油桶内燃放鞭炮发出的响声。这时，荷兰军队和前来支援抗日的澳大利亚士兵早已闻风而逃，印尼人也不想抵抗。结果，日本军队竟然不费一粒子弹，用几个汽油桶就轻易占领了一座城市，真是令人哀叹。

占领梭罗的日本军队似乎人数不多。他们都驻扎在离我家不太远的一座荷兰军队的旧兵营里。此后，日军也许为了提振士气，也为了吓唬市民，几乎天天早上都有大约50名持枪的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和一面白布上写有“武运长久”四个红字的旗帜，列队在市区



巴中，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3

跑步，边跑边用日语高喊：“一、二、三、四！”他们的皮靴踏在马路上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恐怖。这时，街上的行人都纷纷让到路边，我们自然也不敢走到街上，只能躲在门后偷偷观看。

日本占领梭罗后不久，听说逮捕了一些华侨抗日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曾担任荷印军队军官的华人。我后来从老一辈人得知，梭罗有七名华人被捕入狱，他们是李赞冉、冯启明、李云程、吴家咸、魏松德、郭财源和曾永谋。其中，李赞冉先生是梭罗客属公会主席，也是在梭罗的中国国民党和抗日赈济会的主要领导人，他被捕后曾监禁在西爪哇的西冷（Serang）和芝马圩（Cimahih）集中营内，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其余被捕的六人分别为战前中国国民党在梭罗的领导人以及荷印军成员。我父亲和李清波（玉融公会主席）均曾担任梭罗赈济会成员。父亲曾被日军当局传召审问，并遭日本军官掌掴，但幸未被捕入狱，算是逃过一劫。日军对华侨的残暴统治，使我在小小的年纪便开始萌生民族自强的意识。

日军占领期间，华侨兴办的华文中学一律被取缔，我就读的梭罗中华学校只有小学，因此获准继续教学，条件是不得开设英文课程，而要改为日文课。学校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上端，要加一条黄布条，记得上面写有“和平建



巴中学生集体做操

国”四个汉字，以表明学校归属南京的汪伪政权，而不是归属重庆的中华民国政权。

当时我还在读四年级下学期，本来已经学了将近两年的英文，这时也要改学日文了。学校里的老师原来都不懂日文，日文课的老师都是事先经过日本人短期培训，他们学会几个单词，就来教学生，现学现卖，水平当然很差。加上学生对学日文有抵触情绪，也不愿意学，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不过，国文、数学、自然、体育等课程的老师还是很认真教学的。

最令人难忘的事是我们每周一早上的周会。星期一上课前，全校师生都要在操场上集合，面向日本东京的方向，首先一起唱日本国歌。我们也不懂得歌词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日语发音唱。唱完日本国歌以后，我们还要一起用日语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日语“万岁”的发音是bansai，与闽南话“放屁”（pang-

sai）的发音很相近。于是，我们在喊“天皇陛下万岁”时，就故意放大声喊：“Tenoheika pangsai！”（天皇陛下放屁！）喊完以后，同学们都偷偷发笑。校长和老师可能听出来了，但当时既没有日本人在场，也没有录音可查，这样的事自然没有人追究。

神秘的“杨老师”

日军南侵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中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我当时年纪小，自然不了解详情，只是后来从父辈口中得知一二。因为日本占领当局封闭了所有的华文中学校，我在1944年6月小学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一天，父亲让我此后去一位“杨老师”家里补习国文。从此，我每星期去上两个下午的课，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位“杨老师”是一位中年人，个子不高，但身体很壮实，皮

肤白皙细嫩，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当地华侨。“杨老师”不会说印度尼西亚语，也不会说爪哇方言，他的夫人是一位土生华人，穿着纱笼。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说汉语，因为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话，只是点头微笑，也不过问我上课的事。

“杨老师”似乎没有其他职业，他的学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生活来源，只见他家院子里养着很多母鸡，可能是靠卖鸡蛋为生吧。我从未向他交学费，也不知道父亲给他多少报酬。

“杨老师”的国语说得很纯正，显然不是福建或广东人。他只教我读古文，教材就是一本《古文观止》。他对文章内容只作简要的讲解，然后要我背诵。我能熟练背诵他教过的一篇文章后，才教我学下一篇文章。我记得他要我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韩愈的《师说》，接着学的是《邹忌讽齐王纳谏》《宋玉对楚王问》《报任安书》《滕王阁序》《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谏太宗十思疏》《卖柑者言》《捕蛇者说》《陋室铭》等等，一共学了30多篇，每篇都要我能熟练背诵，才算及格。

“杨老师”从不跟我谈时事，更不谈有关抗日的事，只讲解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最后几个月时间，却教我做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怎样设计调查问卷，以及如何分析调查数据，等

等。当然，我实际上没有机会去做任何社会调查工作。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后来回想起这些事，才对这位“杨老师”的来历产生好奇之心。无论如何，他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师。不过，他确实让我打下了国文的基础。

我家里有一部飞利浦收音机，但日本占领时期，当局曾将所有收音机的短波封死，禁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广播。我已想不起从哪里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到1945年8月底，父亲告诉我，以后不用再去“杨老师”那里补习了。我也从此跟他失去了联系。父亲没有告诉我停止补习是什么原因，只是不久以后，听说“杨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西亚，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这时，我已经年满14岁，稍微懂得一点事，才从大人们谈话中听到有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印度尼西亚建立抗日组织的事。我想，“杨老师”显然是化名，他或许就是中国国民党抗日秘密组织的成员。他能隐蔽在梭罗，当然得到梭罗一些华侨的帮助和庇护。他到底姓甚名谁，父亲没有对我说过，我当时也没有追问。多少年之后，我才开始寻找他，但至今不知道他的身世和下落。我希望他当年在梭罗的时候，真是为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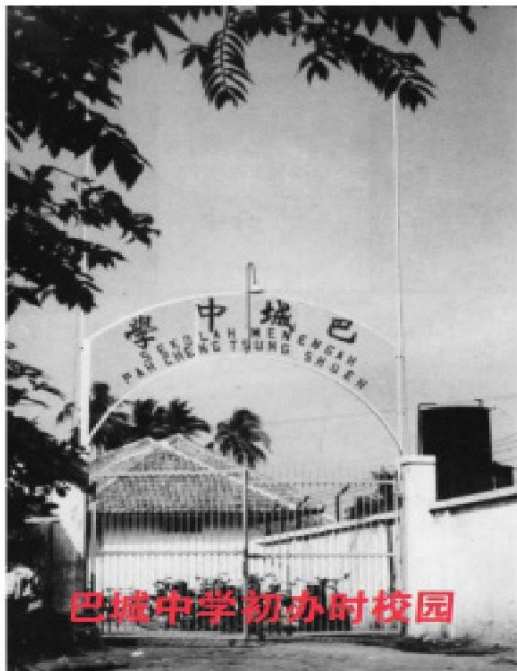
上接印尼新报327

期

梭罗华侨公学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梭罗一些热心华侨教育的爱国人士立即筹备复办华文中学。我就在梭罗华侨公学招生的第一年考进了这所学校的中学部。因为我在小学毕业后曾补习过一些功课，因而顺利升入了华公初中二年级学习。我的弟弟也同时考入华公初一。

梭罗华侨公学创立于1927年，是梭罗著名的爱国华校。二战后复办中学部时，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印尼社会百业凋零，物资匮乏。当时，华公只有一所简陋的校舍，连操场、实验室和图书馆都没有。我上数学课需用的三角板和圆规，都是我从旧货市场上买到的。但是，华公的老师们都以饱满的热



巴城中学初办时校园

情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教课，同学们也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在华公的两年里，这些老师们不仅给了我们许多新的科学知识，也使我们开始接触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也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培育了同学们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此后，师生们尽管散居各地，多年未能重新相聚，但我心中仍时

时刻刻想念母校，想念当年在华公的学习生活。

华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中国著名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学识渊博而又循循善诱，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的校长林维新老师和他的夫人国怀瑛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毕业于中国当年著名的燕京大学。林老师教我们的国文课，他的讲解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又很重视我们的写作训练。除了作文课以外，每个星期还要我们写一篇周记。这对我们提高汉语写作能力很有帮助。后来我在巴中当老师时，也要求学生

写周记。这不但可以让学生提高汉语水平，老师还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加强师生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可以说，华公的教育理念正是秉承教书育人的原则。

国怀瑛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在梭罗这个小地方的华校中，能够有这样好的老师来教我们的音乐课，是十分难得的。国老师教音乐课，与以前的老师最大的不同是，她首先教我们认识五线谱，我们此后学唱的歌曲也是用五线谱记谱的。我们在音乐课上除了唱歌以外，有时还要练习将五线谱的乐曲改写成简谱。国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曲都是中国和外国名曲。华公的音乐课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音乐的无穷魅力。

国老师晚年定居香港，我有机会去香港时，曾看望过她。国老师离开燕京大学多年，却始终怀念母校。她知道我在北大工作，便委托我代她向燕京大学校友会捐款。我曾买了一本燕大校友会出版的纪念

刊送给她，纪念刊内有她当年毕业时的照片，她看到后感到十分开心。国老师后来在香港的养老院安详离世。

我至今难忘的另一位华公老师是教我们英文的林友仁先生。林老师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没有威严的外表，却以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华公继承了当年印尼华校的一个传统，就是中英文课程并重。我们除了上课使用上海开明书局编印的英文教科书以外，林老师还让我们学习其他的英文补充教材，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如《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 剧本中的一些片段。林老师曾让我们背诵安东尼(M. Anthony)在凯撒被政敌刺杀后，在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词。后来我在雅加达巴中任教时，曾在一家欧洲语文书店买到一部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终于读到这部剧作的全文。我1955年回国升学时，将这部书带到北京，珍藏至今。

华侨公学只在



近期正校面目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5

上午上课，因为校舍狭小，也没有足够的体育活动场地，学生下课后，只能分散到玉融公会的体育场打球。那时，梭罗的羽毛球运动很普及，还经常举办城市间的羽毛球比赛，却还没有正规的室内羽毛球馆。比赛多半选择在周末晚上举行，主办者一般租用一座大型仓库作为场地，加装几盏大的煤气灯提供照明。这些临时比赛场地当然没有观众座位，狂热的球迷们只能坐在地上或者站立观看。尽管场地简陋，每次比赛都吸引不少观众，在场外不时可以听到观众鼓掌叫喊的声音。我是这些热情观众之一。

每天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后，都要按照父亲的要求，练写毛笔字，包括两页九宫格的中楷和一页小楷。祖父留下的墨宝成为我最早临摹的范本。不久，我开始临摹颜鲁公（真卿）和柳公权的书法。家里的少量藏书是我的主要课外读物。这个时期，我读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以及《蜀山剑侠传》《七侠五义》和《隋

唐演义》等小说。这些书使我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初步熏陶。

梭罗侨众生活社

日本投降后，梭罗一些爱国华侨青年成立了一个小团体，称为侨众生活社。

在我看来，这个团体似乎有些神秘。我不知道它的会所在什么地方，有多少社员，也不了解它有些什么活动，只知道我认识的几位比我年纪大的同学都曾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后来才有人告诉我，在雅加达、泗水、三宝壟等地都有这类团体。

日本占领时期，印度尼西亚一些爱国华侨曾参加秘密的抗日组织，称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并在梭罗设立了一个支部。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创建者和骨干就是原大同盟的成员游禄中、钟翠兰、李笑梅、张春山、李尊贤、李最贤等人。我后来得知，侨众生活社曾经想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队伍，但因为我当时年纪太小，最终没有让我参加，而只告诉我可以到他们的图书室借书看。他们的图书都是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出版的新

书，存放在我的一位同学的家里，图书的内容大体有两大类，一类是文艺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等。另一类是《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通俗理论读物。我在课余时间，曾借阅这些书籍，而且很快便被这些书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所吸引，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尽管它还只是模糊而浪漫的理想。在我当时读到的新书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它是我日后走向革命的启蒙读物。

梭罗侨众生活社的兴旺时期似乎不长。由于荷兰殖民者发动战争迅速占领雅加达、泗水、三宝壟等沿海城市，新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被迫退守到中爪哇的日惹和梭罗地区，对外交通几乎隔绝。侨众生活社那些朋友和同学大都先后离开梭罗，我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侨众生活社活动的消息。不过，1947年7月我到雅加达巴中读书后，又见到了它的一些骨干成员，也知道在雅加达有一个称为大众社的类似团

体。这时，我逐渐明白侨众生活社和大众社在华侨社会里的影响和作用，我没有加入过这两个团体，但后来与它们的许多社员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

考入巴城中学

1947年6月，我在梭罗华侨公学读完初中。当时，梭罗华侨创办的华文学校都没有高中部。初中毕业后想升学，只有到巴达维亚（雅加达）、泗水或三宝壟等大城市去。父亲和学校老师们商量的结果，决定让我到巴达维亚巴城中学继续学习。

7月11日，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坐火车去巴达维亚。父亲在巴达维亚有一位老朋友冯伯伯，他在草埔有一家经营贸易和汇兑的“平平公司”，我就住在公司的楼上。那两位同学也分别住到他们的亲友家中。我很幸运地考入了巴城中学高中部。

巴中是1945年10月创立的一所新学校，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司徒赞老师，其他老师如刘耀曾、李易洪、刘宏谟、刘宏谦、韦同芳、曹雪贤、林苍、温鸿琳、黄城

温、张德基等，大都是来自八华等著名华校的老教师，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因此，巴中建校初期的师资力量就已经很强。后来又有一些来自国内著名高校的陈熙泽、钟士民等老师来到巴中任教，《生活报》总编辑郑楚耘和《新报》编辑陈寒冰先生也曾到巴中兼任教师。这样多的优秀教师聚集到巴中，是巴中在当时特殊年代恰逢的机遇，也是当年巴中学生的幸运。

司徒赞校长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中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他毕业于广州暨南学校（暨南大学前身），曾在印尼文池兰中华学校和巴城广仁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他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宽厚待人的性格，在华侨教育界赢得一致赞誉，这使巴中对优秀的教育人才具有很大吸引力。司徒赞老师在华社各界的广泛深厚人脉关系，也确保巴中能够获得足够和稳定的经费支持。

物理课老师韦同芳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韦老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严谨求实和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6

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我们除了在课堂上必须认真听课以外，每周还要分组上实验课。我上学期间，巴中新校舍还没有建成，宛朗岸（Blandongan）街的旧校舍太小，物理学实验课只能借用广仁学校教室外的过道进行。尽管条件如此困难，韦老师还是要求同学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实验。他还经常以国内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名校的物理学考题作为我们期末考试的题目。因此，在我们全班50多名同学中，期末考试成绩能够达到及格分数线的不超过10名。

韦老师经常说，巴中物理课考试成绩达到40分就很不错了。此外，韦老师每年还带领高三同学到雅加达和万隆等地参观一些大工厂，培养我们学以致用、注重实践的学习方法。教代数和几何课的是刘宏谟和刘宏谦老师，他们兄弟二人都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两位刘老师的教学同样严格认真。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和求实精神，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受益良多。我在上大学以后，才真正

体会到，不仅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必须在中学期间打下扎实的数理化学基础，对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说，同样需要有严谨求实的思维和严密科学的方法。而学习理工科的学生当然也需要有历史文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的教育。

钟士民老师的文史课活泼生动，使我们接触到许多新观点、新视角，使我在选择人生道路中得到深刻的启发和鼓舞。在巴中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我从一个纯真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个自觉追求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

新生活 新视野

到雅加达巴中上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梭罗这个小城市，来到印度尼西亚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当时华侨人口最多、聚居程度最高的大城市，它不但拥有著名的班芝兰、草埔等华侨聚居区，还有《新报》《生活报》和《天声日报》三家华文报，以及专营中国书刊的南星书店和OK Sport书店兼体育用品公司。历史

悠久的八华中学以及思想进步的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更是全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文中学。特别是它们高中部的学生，除了雅加达本地的华侨子女以外，还有不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华校的优秀初中毕业生。这使我结交了很多新同学、新朋友。

雅加达繁华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对我们这些来自小城市的学生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不过，由于我们这些同学都已带够了衣服和日常必需品，也由于囊中羞涩，所以我几乎没有在雅加达购买过什么衣物。但是，雅加达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确实使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学生大开眼界。雅加达有几家新开张的电影院如Astoria和Deca Park，都是我们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在梭罗只看过几部上海和香港拍摄的国语影片，来到雅加达才第一次看到美国好莱坞最新制作的彩色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讲述波兰爱国作曲家萧邦在巴黎流亡生活的片子——“A Song to Remember”（中文译为《一曲难忘》）。

雅加达另一处吸引我的地方是铭登（Menteng）的一家欧洲语文书店。当时在雅加达只有这家书店销售荷兰文和英文图书。我曾在那里买到几本英文词典、印度尼西亚文词典和世界地图等工具书，以及我向往已久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对我来说，来到雅加达，特别是在巴中的学习生活，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使我开始对祖国的前途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心，也促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更加深入认真的思考。在课余时间，OK书店和南星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在那里买到了鲁迅的许多著作，包括小说集和几乎全部杂文集单行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的作品，而且立即被鲁迅观察事物的深邃眼光和透彻分析所吸引。特别是鲁迅的杂文集，每本都读了好几遍，以致其中许多段落和警句几乎都能背诵不忘。比起在梭罗侨众生活社读过的巴金等人的小说，我觉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批判更为尖锐而深刻，

对人性丑陋面的剖析尤为一针见血。我认为，鲁迅的著作是医治中国社会痼疾的苦口良药。而鲁迅文笔的严谨简练，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我很快成为鲁迅的崇拜者。我在雅加达购买的许多本鲁迅杂文集单行本也跟随我回到了北京，成为我的宝贵藏书。

我在冯伯伯家里天天都阅读《新报》，它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新报》宣扬的华侨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在华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它的评论中肯公允，文字水平也比较高。《新报》每个周末都有半版的副刊，刊登一些评论文章和散文诗歌。不久，我也尝试模仿鲁迅的笔法，撰写一些抨击华侨社会某些陋习的小杂文，以“晨旭”为笔名，投到《新报》副刊。大约是编辑出于对青年学生的鼓励吧，副刊编辑居然相继发表了我写的几篇小文章，还让我去报馆领取稿酬，每篇10盾。这大大鼓舞起我写作的勇气和积极性。于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是《新报》副刊的积极撰稿人之一。